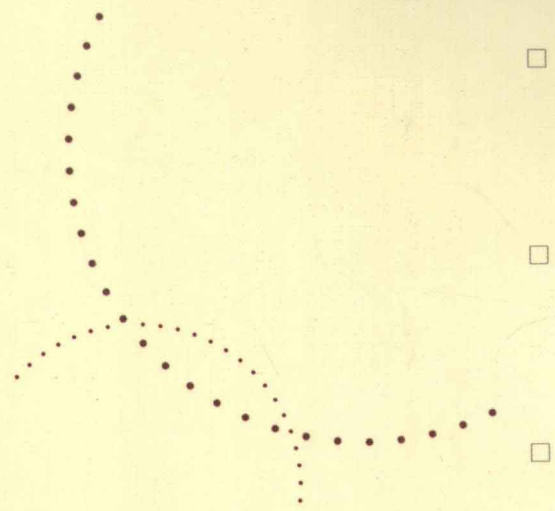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
与现代化使命丛书



政
治
卷

创新与修复

政治发展的
中国逻辑

1921-2011

刘建军 周建勇 严海兵 著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使命丛书/政治卷

创新与修复

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

(1921—2011)

刘建军 周建勇 严海兵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与修复: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1921—2011)/刘建军,周建勇,严海兵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5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使命丛书)

ISBN 978-7-5000-8567-6

I. ①创… II. ①刘… ②周… ③严… III. ①政治—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4639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责任编辑: 郭银星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88390093

<http://www.ecph.com.cn>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342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00-8567-6

定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一、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5
二、中国为什么没有解体?	13
三、中国为什么会崛起?	18
第一章 从君主时代到政党时代:史无前例的政治转型	23
一、君主时代的终结与政党时代的来临	24
二、政党时代诞生的历史脉络	36
三、政党政治的乱象与民主建国的试验	50
四、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失败的国家构建	62
五、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政党—国家体系的形成	75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力与修复力:政治发展的动力与空间	87
一、政党与政治发展的中国逻辑	88
二、中国共产党的特性:一种比较分析	123
三、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修复机制	141
第三章 魅力化与制度化的政党精英:政治权威的塑造	166
一、政党精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166
二、魅力化的政治权威塑造	170
三、制度化的政治权威塑造	175
四、政治权威塑造的类型分析	183
五、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权威塑造的历史演进	185
第四章 连续性与开放性的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188
一、作为意识形态载体的政党	188
二、中国意识形态的危机与重建	190

三、意识形态与发展空间	197
四、连续性的意识形态	199
五、开放性的意识形态	200
第五章 基于信仰与激励的组织体系：使命政治的生成	206
一、使命政治与使命型政党	208
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	215
三、革命型政党的组织激励	224
四、一党执政下的组织激励	231
五、使命政治生成机制的流变、效果及其评价	250
第六章 政党与社会的相互建构：政治生态的平衡	252
一、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式	254
二、革命动员与农民的集体行动	259
三、巩固政权与单位化社会	285
四、社会成长与新政治生态	297
五、政党—社会关系重构与政治生态的平衡	311
结 语	320
一、如何包容多样化的社会结构？	324
二、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冲击？	332
三、如何适应现代性的国家构建？	337
四、如何抵制分利集团的分割？	338
主要参考文献	341
后 记	361

导 论

反观历史，有三件事情是历史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都不曾做到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独立立国、发展兴国。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以上三者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有三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是革命为什么会成功？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解体？三是中国为什么会崛起？这三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无数的西方学者和西方政要。

本书试图将以上三者统一起来，提出革命后国家构建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构成对革命的根本性否定，全球化时代的创新与崛起也不是对改革开放前国家构建原则的根本性颠覆。中国是在没有隔断大传统和灵活确定创新边界和守护修复边界的基础上，通过观念性创新、制度性创新、政策性创新、机制性创新以及结构性创新不断为中国的现代化注入新型的动力。

上海市卢湾区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这是一幢石库门式样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底，门楣有矾红色雕花，黑漆大门上配有铜环。当时，这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住宅。现在尽管装修一新，但它释放出来的那种沧桑感还是让人回味无穷。90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今天，我们依然能清晰地记得那些参加这次会议的人物，他们都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甚至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王尽美、张国焘等。90年后的今天，尽管斯人已

去，但你走进其中，看着挂在墙上的这些风云人物的照片，似乎能看到他们秘密出入这所房屋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紧张而又慷慨的气息。在中共一大会址的隔壁，就是灯火通明的“新天地”。在这片被重新改造过的老城区中，古老雅致的房舍淹没在一片繁华之中，世界著名品牌以及昂贵的奢侈品充斥于内，中外游客三五成群，穿梭于各大豪华酒吧之间，流连忘返，乐在其中。经典历史教科书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时至今日，隔壁的“新天地”似乎就是对这一历史大事件最直观、最形象的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所与享誉全球的品牌、昂贵的奢侈品、豪华的陈设共处一地。中共一大会址所释放出来的历史沉重感守护着这片繁华的土地，“新天地”中释放出来的各种现代气息弥漫在中共一大会址的上空，新与旧、历史与现实、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所具有的张力在这片方圆不过三万平方米的土地上，突然消解。中共一大会址与“新天地”相互映照的独特景观，既是对历史的承诺，也是对现实的关照，更是对未来的期许。我们的追忆与书写就是从这里获得了无限的灵感……

如果我们作为时间中逆向型的旅行者，回到90年前，那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一副景象呢？1921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这所学校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活动的基础上创立的，由此它便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展铁路工人运动的据点。工人在这所学校中，从识字开始，学国文、常识（包括自然常识和社会常识）、铁路常识。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这个学校是我党在此地工作的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果然不到半年，五月一日劳动节，长辛店公然发生一个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①后来的历史学者作了一个统计，说是在1921年中国爆发了55起大罢工。^②可见，在新年第一天发生的故事并不是

① 转引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② [美]伊佩霞著，赵世瑜等译：《剑桥插图中国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孤立于整个历史之外的。当时的中国，从名义上来说，属于北洋政府时期，1921年担任大总统的就是国学功底深厚、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的徐世昌。“北洋政府”的叫法说明中国当时还处于南北分治之中，相对于北方的北洋政府，孙中山在南方建立了革命性政权。日后举世闻名的北伐就是从广东开始的。南北分治、军阀专制、士绅困窘、民众迷惘、学生涌动、外强介入、学说纷纭、集团并起、政党林立、派系纷争、枪声四起，这就是1921年中国所面临的景象，它使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沉浸在一种深沉的暮色之中。当大多数普通民众还在为生活的困窘而一筹莫展、两眼迷茫的时候，一群穿着长袍、外表斯文的知识分子走在了一起。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为开放、最富有魅力的城市，成为他们汇聚的地方。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12个读书人在不同时段悄然进入了上海法租界的一所老房子内，在此秘密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就是后人熟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书上讲，会议进行期间，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引起了与会者的警觉，使得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迅速移至与上海相隔不远的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继续举行。这戏剧性的一幕更加赋予了这次会议的神秘性与重要性。现在，当你去嘉兴旅游的时候，嘉兴人会自豪地告诉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是这样的：上海“结婚”，南湖“分娩”。历史学家是这样描写这一场景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后来称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召开。代表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但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陈在广州，周佛海代表其小组，而张国焘代表李的小组。尽管他们两人都缺席，但41岁的陈独秀和32岁的李大钊仍然被尊称为党的共同创始人。虽然中央党部在上海建立，但李在北京的支部却仍然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南陈北李”的说法显示了紧密统一的党组织还没有诞生。^①

^① [美] 徐中约著，朱庆葆等译：《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13页。

历史学家的说法正确与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我们更愿意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置于长远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也更愿意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关系视为一个长时段的事件来审视。实际上并不是那一次大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而是由一连串的教训和经验共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正是在这一连串的教训和经验中，中国共产党孕育出了自己的领导集体，开创出了一条革命之路，完成了国家构建的理想，缔造了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天起，个体化的努力与共产主义小组体制就逐渐被纳入到以政党为载体的集体行动中来了。正如英国学者劳伦斯·斯通在其名著《贵族的危机》一书中所说：政党组织和公众集会的发展，降低了个人关系作为政治影响关键的重要性。^①可以说，军阀组织、秘密会社型的革命党甚至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都没有完全摆脱对个人关系的依赖。而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发展历程之中，她做了三件历史上任何一个领导集团和领导阶层都不曾做到的事情：革命建国、独立立国、发展兴国。革命建国的模式与道路、独立立国的原则与宏观、发展兴国的成效与经验，都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研究就是将以上三者融合起来，将过去90年政治发展的整体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一样遭致解体，中国的和平崛起等已成为不容否认的社会事实。从革命成功到经受各种危机的考验，从“文化大革命”后的自我修正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共产党经历了90年的发展历程，使中国成为除新加坡之外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现代化的范例。^②恰恰是这一系列的社会事实，使西方政要和西方学者表现出难以破解的困惑与迷惘。令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对中国做出的所有预测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西方的各种经典理论面对中国时顿时丧失了解释的效力？当他们试图用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这一模糊性的术语来解释中国现代化

^① [英] 劳伦斯·斯通著，于民等译：《贵族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刘建军：《一党执政体系下的现代化》，载刘建军、陈超群主编《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复旦政治学评论》第3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道路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本书试图在政治学的领域内，以政党作为视角，解剖中国90年来政治发展的逻辑。既然是对中国过去90年政治发展历程的系统研究，自然有我们要关注的核心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一、革命为什么会成功？^①

现代社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革命催生出来的，无论是苏俄、法国一锤子式的革命，还是英国渐进式的突破，以及中国长波段的革命，都是现代社会的助产婆。革命既不是精英的游戏，也不是大众的狂欢，而是两者共同缔造的历史性突破。纵观各种各样的革命理论，我们觉得还是马克思说得简洁清晰：“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② 马克思的说法回答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之前，为什么那些与工农脱节的变革或革命都以流产而收场。因为它们仅仅是精英的独唱。

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包含着不同于儒家思想的新型意识形态要素，但其最终也没有摆脱古代政权兴替的线路。近代以来，随着王朝政权所赖以生存的各种生态环境的改变，与古代政权相隔绝的新型要素逐渐生长、蔓延开来。其中由君主专制转向共和体制，乃成为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象征。当然，这场革命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是不彻底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意味深长地说：旧制度崩溃了，但共和派革命党人之混杂的集团却并未对此做出过真正贡献，仅仅充当了无足轻重的支持力量。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不像大家为了把它纳入到固定的历史模式中而声称的那样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而仅仅是中国政权解体的一个简单插曲。孙文辞去大总统一事本身就暴露了这个根本没有兵力

^①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陈明明教授的《党治国家的理由、形态与限度——关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讨论》一文，在征得陈明明教授的同意下，引用了其文中的部分内容，在此对陈明明教授致以谢意。参见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8页。

和收入的共和国的极端软弱性。归根结底，在一些政治难民的帮助下，这个共和国只不过是抛弃了由北京政府组成的中央政权之虚假权力的绅士们的旧省议会的延续。^①袁世凯短暂的专制及其帝王梦的破灭，直接导致了中国进入了武夫当国的时代。这样一个脱离知识化轨道和文治精神的政权形态可以与历史上的五代十国相提并论。私人军队的崛起和军事集团的登台使得国家为武力所分割。尽管蒋介石借助革命力量和古老盟誓制度的混合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但军事集团对国家的分割以及真正的国家独立和国家构建并没有完全得以铺开。特别是蒋介石在1921年推行清党运动之后，它与传统统治阶级和新型财富集团的结盟，使其彻底丧失了变革中国社会的动力。其成功之处充其量是以对银行系统越来越严密的控制而确保了该政权的财政平衡。^②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要想真正完成国家的独立、社会的变革等历史性责任，单靠一种力量是无济于事的。试想，单单依靠新型思想的知识群体无法动摇和改变真正的权力结构，单单依靠新型的军事力量只能成为毫无远见的军事集团，单单依靠实业家的支持只能成为寄生性的资本化政权，中国的变革需要一种能够将以上各种角色综合在一起且能克服其缺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呢？

近代以来的革命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驾驭和创造了新型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奥秘。中国革命既是“发生”的，又是“发动”的。^③所以，任何静态的结构论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革命不是社会结构变动自发导致的，更不是必然导致的。毕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因于它夺取社会革命领导权的能力。在1946年，费正清就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公认的土地改革冠军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非来源于外部的援助，而是来源于农民起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

①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② 同上注引书，第556页。

③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量的熟练运用。共产党人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垄断这些力量，而是作为国民党自动放弃的结果，最终领导了这些力量。因而，中国共产主义的土生土长性质，全然不同于东欧从外部强加的共产主义。^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政治力量呢？她所发动的革命具有哪些独特性呢？

美国学者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把农民阶级作为研究革命及其后果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比较视野中对中国革命进行了非常独到的研究。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新型城市的崛起，大量农村地主从农村迁往城市，例如上海的崛起就与太平天国起义导致地主阶级和地方名流迁入上海寻求安全与保护有着重要关系。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地主与农民的联系日益松弛，依靠乡绅和地方名流建立起来的内聚力迅速削弱。如果农村共同体像在日本那样得以保留，就会与统治阶级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庶几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乡村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的联系过于脆弱的直接后果就是革命发生的概率直接提升。所以，摩尔断言：中国农村缺乏内聚力，这有助于共产党不断地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也使共产党打碎并改造旧的农村制度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特别是日本的侵略和外国征服者的占领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②

摩尔的学生西达·斯考切波在结构论道路上走得比其老师还要远，她采用了一种极端结构论的解释，认为制度性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联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是寻找革命动因的关键性因素。这是一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它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③斯考切波认为，中国共产党寻求农村资源以抗击日本侵略者、军阀以及国民党军队，并最终引发了中

① [美] 保罗·埃文斯著，陈同等译：《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② [美] 巴林顿·摩尔著，托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③ [美] 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

国农村的社会革命。相应地，社会革命则最终触发了农民参军的热情，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使得红军能够把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队赶出城市，赶出了中国大陆。^① 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得以展开，从理论上来说，得益于支配阶级的脆弱性、以农民为多数、农村居支配地位的社会、传统的农业—商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改造、农民自身无力造反、对民众进行政治—军事动员，以及为反对国内反革命和竞争对手的战争提供支持并反对外来入侵等诸多结构性条件。在斯考切波看来，1949年前的中国经济更类似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但中国革命的后果更接近俄国而不是法国。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革命和苏俄革命同属共产主义革命谱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在苏俄的指导下开始发展的，都借鉴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模式。……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列宁主义组织模式和意识形态遗产就使其自然地模仿苏联政权的基本特征”^②。其次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对工业化的强烈欲求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加强苏俄式党治国家的模式。应该承认，斯考切波的“国家中心论”是对社会过程方法的决定论取向的一个克服，但是，她的“结构性视角”却落入了另一种决定论的窠臼——在她看来，社会革命是自然到来的，不是被制造出来的（*Revolution comes, not made*），“结构性视角”排除了“意志论”或“目的论的想象”，排除了精英的选择或政治领导，以及排除了文化、理论、意识形态、策略等因素，在结构的强制面前，革命的展开方式“取决于每次革命形势最初的出现方式”，取决于“制度性的决定情势、群体之间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在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结构中的各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③

邹谠在《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一文中，认为中国革命中的创新包括依靠农民的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扩大联合阵线、政治与文化变迁的必要性等多重要素。更为重要的

① [美] 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314页。

② 同上注引书，第18—19、317页。

③ 同上注引书，第18—19页。

是，这些创新在自上而下的联系、横向联系以及自下而上的联系中不断得以系统化、常规化，形成了一种总体效应，而不至于相互抵消，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正确的策略选择，铸就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①他极力反对斯考切波结构论的解释，邹谠并不否定人类行为和历史演变背后的社会结构的限制，他承认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有一种结构性的约束在起作用，这种“结构约束”构成了“宏观历史”的背景，从而构成人们行动的动机、理由与基础。邹谠更愿意把这种“结构约束”理解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场景”，即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对世界现代化潮流中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回应，在这种“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场景”的结构约束下，由早期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带来的冲击，通过后发边陲国家内部特定的政治体系和阶级结构，对边陲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②在邹谠看来，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同，它不是一锤子买卖（没有攻打巴士底狱那样的戏剧性事件），它由许多事件组成，辗转曲折、大起大落地构成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也不同，它不是城市无产阶级的起义，而是乡村劳苦大众的动员，它采取过极端激进的政策，也采取过非常温和的政策，是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边缘走向中心的革命，在群众（农民）动员中不间断地建设新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制度。和斯考切波的“革命自发论”不同，邹谠是“革命制造论”——他认为“中国革命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所制造出来的”^③。“革命制造论”强调的是宏观结构下的行为主体的主动选择。结构有强制作用，但结构的强制不是机械的、线性的，人在结构中仍然拥有选择的自由，甚至结构也不过是人在历史的活动中的形成。邹谠比斯考切波提供了更多的富有启迪意义的地方还在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特别值得在充分重视宏观结构约束的同时，研究微观机制作用下行为主体的选择如何塑造和影响了宏观历史的面貌及其发展线索，以及二者间的内在关联。换句话说，他除

①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第125—137页。

② 同上注引书，第118页。

③ 同上注引书，第145页。

了有“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还有“微观机制”(micro-mechanism)。不过邹谠在本文中运用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进行的进一步的解释,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但他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宏观解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把中国革命新型的结构特征、制度性特征以及策略性特征揭示出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兴领导力量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中国近代变革孕育出了多种类型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在清朝灭亡之后,各种革命力量粉墨登场,充斥于中国政治舞台。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有三种类型的革命力量值得重视: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二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三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致力于通过文化思想革命和科学救国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各种新型力量。除此之外,还有多种披着革命外衣的中间力量甚至反动力量,他们对革命的理解缺乏现代内涵。以上三种力量在历史上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能抓住中国之根本问题者,并不是国民党和试图寻求中间道路的知识群体,而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忽视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力量的使命与抱负,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采取相对主义或历史偶然论的解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当然,没有知识分子推动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之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难以在中国传播,甚至国民党采用的折中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难以成型。对此,徐中约先生这样评价道: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的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涌入,在社会重建和民族振兴方面产生了两种相反的观点:由胡适阐释、后来为国民党接受的实用主义及逐步进化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从1921年以降的中国现代史,主要是这两个党派及其不同途径斗争的历史。^①但是,仅仅有思想文化上的革命,是无法救中国的。这也是后人过分夸大思想文化革命之功效的弊端所在。因为文化层面的解释关注意识形态的力量,但导致不同革命

^① [美] 徐中约著,朱庆葆等译:《中国近代史》(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07页。

力量选择不同意识形态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呢？文化层面的解释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国际层面的解释关注中国革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一方面，俄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先导，俄国与中国的联系成为影响中国革命兴起的重要变量。以俄为师，对国共两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只不过，在阶级基础于1927年遭致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国民党就基本上告别了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追随，这也是其革命性日渐弱化、退回到权贵统治道路上的原因，更是其被共产党取代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独特模式，刺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独立探索革命道路的勇气。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共产国际的帮助非但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而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对经典政治斗争策略的创新，孕育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结构层面的解释关注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正是阶级基础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革命道路。这一解释虽切中要害，但它对为什么不同革命力量会选择不同的阶级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回答。更为重要的是，结构论者认为革命是发生（happen）的，而不是制造（make）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斯考切波就认为革命并不是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情势之下。社会革命是多种社会力量在某一历史时刻复杂交织的后果。革命的最终后果超出了任何单个参与主体的意图。^① 显而易见，这种结构论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她把革命中的主观能动性、葛兰西所说的阶级意识等直接决定革命成功的因素彻底否定掉了。就是斯考切波的老师摩尔也认为，我们说存在着革命条件并不意味着革命会自动爆发。^② 理性层面的解释关注的是对有效整治策略的选择，例如邹谠就提出：不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曾经作出了许多不一样的选择，无数次地改变了他们的战略策略，在不同的时期，既采取过极端的政策，也采取过非常温和的政策，而且从不间断地建设新的军事组织及其制度。这一革命，为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③ 但

① 参阅何俊志为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撰写的译者序。

② [美]巴林顿·摩尔著，托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③ 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2年版，第123页。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决定着政治策略的选择呢？理性层面的解释对此一片茫然。制度层面的解释关注组织体系的构建以及各行动者所共同遵守的规则的差异。但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一组织体系和共同遵守的规则的形成呢？制度层面的解释并没有触及这一点，因为制度在此成了一个静止的变量。看来，许多研究者不自觉地已经把寻找革命的动因和革命成功的原因这两个问题混同起来了。对此，我们更倾向于采用马克思式和列宁式的解释模式，在领导视角与结构视角的结合中寻找中国革命成功的奥秘，即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奥秘在于新型领导阶层与农民阶级的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巨大政治能量。

首先，从领导层面揭示历史之谜，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我做教授时，一直相信历史是规律和结构所支配的。等我做了国务卿之后，才懂得个人可以改变和创造历史。因此，从领导视角揭示历史之谜并不是什么英雄史观或个人意志决定论的简单翻版。诸多学者似乎都注意到了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的关联性，但摩尔斩钉截铁地说：农村社会中刺激革命发生的因素能否产生政治影响则取决于农民的疾苦能否与其他阶层的疾苦融合汇流。仅靠农民阶级本身，是永远无法实现一场革命的。^①其次，如果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大众与领导群体的结合，打着革命旗号的变革就极有可能蜕变为宫廷式的“政变”。托克维尔说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②确切地说，应该是唯有阶级及其代表者和领导者才能占据历史。这就是马克思所作的阶级自在（class in itself）与阶级自为（class for itself）的区分。^③

① [美] 巴林顿·摩尔著，托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② [法] 托克维尔著，桂裕芳等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1页。

③ [英] 理查德·斯凯思著，雷玉琼译：《阶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